

第十屆中國域外漢籍
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編 印

第十屆中國域外漢籍
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
編 印

第十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精裝定價：新臺幣八〇〇元

主 編 陳 捷 先

編 輯 陳 龍 貴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 合 報 系 文 化 基 金 會

總經銷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55 號

電 話：23620137・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3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目次

中文部分

關西大學漢籍特藏簡說	石曉軍	1
新井白石的日語研究以及中國明代的學術	古藤友子	37
《朝鮮書目》介紹及關於劉喜海與朝鮮學者之間 文遊的研究	朴現圭	59
《板橋雜記》在日本的流播	李進益	105
風月錦囊蔡伯皆與元本琵琶記校議	李殿魁	125
日本佐藤坦《孫子副詮》與清陳任暘《孫子直講》 比較	汪治平	147
高似孫《史略》之研究	林天人	203
崔溥從中國還國後之經歷考	金在先	221
韓國類書簡說	崔 桓	241
三教合一論與「三一教」並論其海外流傳情形 ——以新加坡「三一教」現況為例	張 璉	261
朝鮮與清朝天人感應思想的比較	莊吉發	295
安井小太郎的《經學門徑書目》	連清吉	331
從抄本《東華備遺錄》看蔣良騏《東華錄》刻本 的內容	陳捷先	363
從《李朝實錄》看朝鮮君臣對「三藩之亂」的反應 ...	葉高樹	385

日本所藏殷周青銅器銘文簡介	葉達雄	417
《長崎先民傳》初探	鄭瑞明	431
佚存日本的《四書》與其相關論著	鄭樸生	459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漢學研究	戴瑞坤	511

韓文部分

《海東詩話》簡介	金周漢	555
慕齋金安國先生勸小學詩研究	金時晃	579
韓國金石文中所見王羲之書考	金榮淑	599
論朝鮮末葉刊行西廂記註解本	金學主	637
流傳日本之儒家類韓國版韓漢籍	沈暉俊	659
朝鮮正祖代奎章總目之編纂與其特徵	鄭萬祚	675

日文部分

戶坂保佑と天文書	中村璋八	703
新井白石の日本語研究と中国明代の學術	古藤 友子	719
『黃帝蝦蟇經』の成書時期と日本伝来	坂出祥伸	743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 の展開	成澤 勝	761
朝鮮本『佛說廣本太歲經』考 一朝鮮における道教受容と疑偽經典一	増尾 伸一郎	775

關西大學漢籍特藏簡說

石 曉 軍

談及中國域外漢籍問題，日本庋藏之漢籍素來爲士林所矚目，自上世紀中晚期以來，中土人士赴日訪籍求典者既不絕於途，日本學人亦就此多有述作。然縱覽有關論著，便可發現其多囿於一些知名度較高的漢籍庋藏重鎮，諸如宮內廳書陵部、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天理圖書館等處，而較少言及其餘。其實，在日本衆多的漢籍特藏中，尚存在一些較少爲人所注目，卻具有相當豐富內涵的漢籍特藏群。關西大學的若干漢籍特藏——承襲大阪舊漢學塾藏書的泊園文庫、囊括日本東洋學泰斗內藤湖南恭仁山莊藏書的內藤文庫、日本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先驅之一、關西大學增田涉教授的增田涉文庫等均各具特色，交相輝映，構成了關西大學獨特的漢籍收藏景觀。本文擬圍繞泊園文庫和內藤文庫略事評說，以期拋磚引玉。不當之處，敬祈方家賜正。

一 泊園文庫

(一) 泊園書院與泊園文庫

泊園文庫是關西大學最早設立的漢籍特藏文庫之一。

其起源又可溯至幕末大阪漢學重鎮——泊園書院。

泊園書院係由江戶時代後期大阪漢學家藤澤東咳（名甫，字元發，號東咳、亦號泊園，一七九四～一八六四）所創設的一所漢學塾。藤澤東咳於寬政六年（一七九四）生於贊歧國香川郡安原村（今屬四國香川縣），自幼好學，初隨漢學家中山城山修習徂徠學，後遊學四方，廣為求師訪友，二十五歲時為習唐音（漢語）曾專程到九州長崎遊學三年。文政七年（一八二四）始至大阪開業授徒，翌年便在阪淡路町創設漢學塾泊園書院。其後，經過藤澤家幾代的苦心經營，至幕末時，泊園書院已享譽日本全國，發展成為關西地區最著名的漢學教育中心之一[●]。

泊園書院以「經世實學為宗旨，以造就實用有為之才為綱目」[●]，在辦學方向上承襲徂徠學（以荻生徂徠為代表的古文辭學派）之學統，揚棄宋明理學注重思辯的傾向，力主經世致用，致力於培養有俾於社會的實用人才，給幕末日本的漢學界注入了一股新風。從其開設的課程來看，全部課程分為九等，一～四等為高等科，五～九等為初等科。初等科以習修漢文為主，高等科則遍涉經史子集諸書，通過講讀、輪讀、會讀、質疑等多種形式研讀漢文典籍[●]。書院亦不餘力廣為搜求漢籍。經過藤澤東咳、其

● 石濱純太郎，《浪華儒林傳》，頁三十五～四十七（藤澤東咳）（全國書房，一九四二）。

● 永田二郎編，《東咳先生略傳》（一九一五）。

● 壺井義正，《泊園書院について》（《籍苑》第二十七號所

子藤澤南岳（名恒，字君成，號南岳，一八四二～一九二〇）、其孫藤澤黃鵠（名元造，字士亨，號黃鵠，一八七四～一九二四）、藤澤黃坡（名章次郎，字士明，號黃坡，一八七六～一九四八）三代四位院主的不懈努力，泊園書院的藏書已頗具規模。及至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藤澤南岳華甲之時，諸弟子已有創設泊園文庫之議，後因經費拮据，時局動盪而未果。其後在戰爭期間的險惡環境中，在黃坡的苦心經營下，書院雖勉力維繫運作，然實已無法恢復昔日盛況。一九四五年三月大阪大空襲中，泊園書院化為灰燼。所幸其藏書未受大損，書院活動勉強維持至一九四八年，隨著黃坡的逝世而告終焉。前後經歷一二〇年。

在此期間，藤澤黃坡於一九二二年被關西大學預科聘為講師，一九二九年晉升為教授。一九三八年黃坡自關西大學退休後，仍繼續以兼任講師身分執教於關西大學，一九四八年被關西大學贈以首任名譽教授稱號。藤澤黃坡與關西大學的這種淵源關係為日後關西大學泊園文庫的設立奠定了基礎。

一九五一年，經藤澤黃坡的內弟——著名東洋史家、

收，關西大學，一九八八年九月）當時九等科所學內容分別為：1.經說諸錄；2.詩、書、經濟諸書；3.論語、周禮；4.明律、莊子、五代史；5.通鑑、孟子等；6.左傳、史記、八大家、大日本史等；7.文章規範等；8.十八史、日本外史等；9.四書五經、徂徠集等。

關西大學教授石濱純太郎氏（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從中幹旋，黃坡的長子藤澤恒夫氏（一九〇四～一九八九）將泊園書院舊藏一舉捐贈予關西大學，關西大學泊園文庫因此而設立。在這批藏書以及遠東國際軍事審判資料的基礎上，關西大學成立了東西學術研究所，並專闢第三研究室從事泊園文庫的整理工作^①。

（二）泊園文庫藏書鳥瞰

現藏於關西大學圖書館地下二層書庫內電動密集書架庫的泊園文庫，藏書約兩萬兩千餘冊，其中絕大部分為漢籍（包括和刻本漢籍及日本學者的漢文著述），幾乎網羅了漢學研究的所有基本文獻。一九五八年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壺井義正氏編成該文庫的藏書書目，按經、史、子、集四部著錄漢籍（包括和刻本）及準漢籍（日本人的漢文著述）六千餘種，由關西大學出版部刊行。其後，壺井教授又按日文假名順序，編寫了該書目的書名索引和著者索引，一九六〇年復由關西大學出版部刊行^②。通過這部藏書書目，我們可以略窺泊園文庫藏書之一般狀況。下面主要根據該書目，並參稽若干具體

●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報》第一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壺井義正編，《關西大學泊園文庫藏書書目》（關西大學出版部，一九五八，非賣品），同氏《關西大學泊園文庫藏書書目 索引之部》（同上，一九六〇，非賣品）。

事例，來對泊園文庫藏書的特色作一簡略考察。

據筆者的粗略統計，除去各類稿本不計外，在泊園文庫計約六千二百餘種二萬二千餘冊的藏書中，純漢籍（即中國刊行之典籍）約四千二百八十餘種，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九，若再加上和刻本漢籍三百四十餘種，則狹義的漢籍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此外還有一千五百七十種左右，主要是日本人的漢文著述（其中亦間有少量和文著述），亦可稱之為廣義上的漢籍（準漢籍）。由此可見，說泊園文庫是一所漢籍特藏文庫，亦毫不為過。該文庫的基本特色，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1. 泊園文庫藏書的配架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排列，日本人的漢文著述亦按其性質分類置於四部各門類之中，並無特殊處置。例如：伊藤長胤（東涯）的《周易經翼通解》、《讀易圖例》、荻生雙松（徂徠）的《周易解象辭全》等置於經部易類之後；太宰純（春臺）的《詩書古傳》置於詩書類之後；安井衡（息軒）的《左傳集釋》置於春秋類之後；皆川愿（其園）的《四書繹解》、竹添光鴻（井井居士）的《論語會箋》、伊藤維楨（仁齋）的《語孟字義》等置於四書類之後；近藤元粹（南洲）的《孝經集注》置於孝經類之後；山井鼎（崑崙）的《七經孟子考文》置於諸經總義類之後；僧空海的《篆隸萬象名義》、《文鏡秘府論》則置於小學類之後。就史部而言，從《日本書記》等「六國史」到賴襄（山陽）的《日本外史》等日本史乘均分別置於正史、別史之後；僧道猷的《弘法大師弟子譜》、岡白駒（龍州）的《皇朝儒臣傳》、

原善（念齋）的《先哲叢談》等置於傳記類之後；龍公美（艸廬）的《中華輿地志》及日本諸風土記則置於地理類之後；伊藤長胤的《唐官鈔》、《制度通》等置於職官政書類後；僧最澄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越州錄》等置於書目金石類之後等等。在子部方面，江戶時代諸家之撰述亦分別置於諸子類各家之中，如冢田虎（大峰）的《荀子斷》、荻生雙松的《辨道》等置於儒家；藤澤恒（南岳）的《評釋韓非子全書》等置於法家；龜田興（鵬齋）的《黍稷稻粱辨》等置於農家；小野職博（蘭山）的《本草綱目啓蒙》等置於醫家；猪飼彥博（敬所）的《太史公律曆天官三書管窺》等置於天文算學；服部元喬（南郭）的《大東世語》等置於小說家；僧空海的《三教指歸》等置於釋家；市川三玄（米菴）的《墨場必攜》、荻生雙松的《琴學大意抄》等置於類術類；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貝原好古（恥軒）的《中華事始》等置於類書類之後等。至於集部，以江戶時代諸儒的漢詩文集為主，各類文集分置於別集、總集、尺牘等類之中，約占總數之半（詳後述）。因而，藏書書目亦據此原樣著錄，遂形成了以漢籍為主，漢和書混雜分類著錄的特色。這一點既是泊園文庫的一個明顯特點，同時也是日本著錄漢籍時的一般傾向。關於這一方面，我曾在拙稿《日本漢籍著錄及其特色》（第九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提交論文）中有過評論，這裡不再贅辭。

2. 泊園文庫所藏中國典籍，從版本角度來說，似乎並無特別的珍本秘籍。其大半係清刻本，亦間有少量的明刻

本。且其主要收錄於諸叢書之中。如宋左圭輯刊的《百川學海》、元明之際陶宗儀的《說郛》、明陶珽的《說郛續》、明程榮等輯刊的《漢魏叢書》、明闕名輯的《居家必備》等宋明人所輯叢書，以及清顧修輯刊的《讀畫齋叢書》、清張潮等輯的《昭代叢書》、清吳省蘭輯刊的《藝海珠塵》、清王焯輯的《檀几叢書》、清王文誥輯的《唐代叢書》、清阮元輯的《皇清經解》、清鮑廷博校刊的《知不足齋叢書》、清趙尙輔校刊的《湖北叢書》、清張伯行輯的《正誼堂全書》、清留雲居士輯的《明季稗史彙編》、清王子興輯的《十子全書》、清梁廷桢的《藤華亭十種》等清代叢書。這些叢書基本上都是坊間常見的版本，其大部分又都可以在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初編》中見到。這一點反映了泊園文庫藏書的又一特色：即收書注重實用性，盡可能齊備地網羅漢學教育及研究的基本文獻，而不只拘泥於搜奇獵珍。

儘管如此，泊園文庫所藏漢籍中亦並非沒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善本，上文提到的陶宗儀的《說郛》，竊以為就是其中的好例之一。

元明間浙江天台陶宗儀纂輯的《說郛》一書，係陶氏廣採歷代經史雜記小說約千餘種匯纂而成。一般將其視作叢書，然因其對採擇的每一種書，並非全文照錄，而是在保留原書書名卷數及撰人的情況下，選抄其中若干條。故而亦有人將其視為如《太平廣記》一類的雜記小說總集。

《說郛》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叢書，但因其在保存失傳古籍，輯佚、補闕、校勘元以前歷朝著述、尤其是唐宋人著

述方面所具有的明顯價值^①，加之其在中國叢書刊刻史上的承前啓後作用^②，所以歷來深爲士林所珍重，被譽爲「考證之淵海」（四庫提要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然而，這樣一部重要典籍的版本狀況卻頗爲錯綜複雜，撲朔迷離。陶氏之原本早已亡佚，明代其他諸刊本亦僅見於個別書目著錄，原物不得復見。因而，除若干百卷本明抄殘本分藏於各處（現主要收藏於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處）以外，有清一代坊間流行者，則似乎只有傳明陶珽重輯、清順治三年浙江督學李際期宛委山堂刻一百廿卷本。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張宗祥主持京師圖書館以後，歷時六年，以館藏明抄殘本、涵芬樓藏明抄本、傅增湘藏明抄殘本等六種明抄本相互校勘，得一百卷定本。並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由商務印書館線裝排印，世稱涵芬樓校印百卷本或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以下簡稱爲商務本）。自此本一出，論者多稱其善，認爲其頗存南村之舊，可據之直窺陶宗儀《說郛》之原貌。一九六三年臺北新興書局首次將商務本景印出版，以廣流傳；繼之，一九七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次景印商務本行世；一九八六年，北京中國書店亦將商務本加以景印，分裝十

① 參見昌彼得，《說郛考》上篇第十二節〈說郛之評價〉（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九）。

② 參見謝國禎《叢書刊刻源流考》（原載《中和月刊》三卷十二期，一九四二；同氏著《明清筆記談叢》，頁二〇二～二四一重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新版）。

二册出版；一九八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復以商務本、卷首署「天台陶宗儀纂 姚安陶珽重輯」的清李際期宛委山堂刊《說郛》一百廿卷本、陶珽《說郛續》四十六卷本匯集景印，名之爲《說郛三種》，分裝十大册出版。是故，除原有的李際期宛委山堂本以外，以商務本的流布最爲廣泛。世人凡言及《說郛》一書，所指即是宛委山堂本和商務本。歷來有關《說郛》之研究論著，諸如法國伯希和氏的〈說郛考〉^⑤、日本渡邊幸三氏的同名論文^⑥、中國景培元氏的〈說郛版本考〉^⑦、昌彼得氏的《說郛考》^⑧等對於《說郛》的纂輯與重輯、校訂刊刻之原委、著者家世生平、版本源流、現存諸本之間的關係、所收書目等考證甚詳，多有發現，亦皆以爲除鈔本以外，現存版本當不出上述兩個版本之外。如昌彼得氏便說：

-
- 伯希和著，馮承鈞譯，〈說郛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九期，一九三二）。按伯氏論文原題爲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Chouo Fou*，一九二四年發表於《通報》。當時張宗祥校抄的商務本尚未問世，故伯氏所依據者主要是宛委山堂本及其他鈔本。
 - 渡邊幸三，〈說郛考〉（《東方學報》〔京都〕第九册，一九三八）。
 - 景培元，〈說郛版本考〉（《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創刊號）。
 - 昌彼得，〈說郛考〉（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九）。

說郭一書，今世所通行，凡有二本。一爲明末武林宛委山堂刻一百廿卷本，其本係經明人竄亂重編，已失原貌；一爲涵芬樓排印海寧張宗祥校一百卷本，其本則出明鈔，頗存南村之舊。①

昌氏的論考可謂是目前有關《說郭》研究之集大成，其說自當有代表性。上海古籍出版社匯印《說郭三種》，顯然有集成《說郭》版本之意圖，在其所附出版說明中也持這一看法②。可見，唯李際期的宛委山堂本和張宗祥校抄的商務排印本爲現存版本之說，似已成爲學界之定論。

然而，據泊園文庫藏一百二十卷本《說郭》來看，其卷首撰者題爲（參見附錄圖一）：

興國盧 高
天台陶宗儀纂 河北張縉彥 補輯
浚陽谷應泰

此與通行的宛委山堂本卷首所題之撰者「天台陶宗儀纂姚安陶珽重輯」（參見附錄圖二）顯然有異。考泊園藏本三位補輯者，盧高事跡不顯。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祇知其爲湖廣興國州（按今湖北省陽新縣）人，清順治九年壬辰科（一六五二）進士，榜列第三甲第三百零

① 同上書，頁四十三。

② 《說郭三種》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

五位（第三甲共三一七名）^①，張縉彥則為明末清初的風雲人物。《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及《清史稿列傳》卷二九八中有傳。據之可知其為河南新鄉人，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進士，明崇禎年間歷知縣、戶部主事、翰林編修、兵科都給事中等職，崇禎十六年官至兵部尚書。明亡後先降李自成，後又降清。初不為清所用，其後經其同鄉給事中蘇文樞極力薦舉，始於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出任山東右布政使，次年（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遷浙江左布政使。此後直至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遷工部右侍郎為止，一直在浙江左布政使任上。補輯《說郛》一事，當為順治十一年至十五年任浙江布政使期間。其署籍「河北」，概因其老家新鄉縣位於黃河以北之故。第三位谷應泰即《明史記事本末》的作者。據《清史列傳》卷七十〈谷應泰傳〉，應泰字賡虞，直隸豐潤人。順治四年（一六四七）舉進士，歷任戶部主事、戶部員外郎，後遷浙江提學僉事。其出任浙江學政的時間，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考訂，在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五月^②，其任職下限雖無確證，然從《明史記事本末》自序，署「順治戊戌冬十月提督兩浙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撰」看來，應泰在順治戊戌（十五年）時還在浙江提學僉事任上當無問題。又

● 參見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頁二六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

● 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第四冊〈學政年表〉（中華書局，一九八〇）。

據同書，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王康侯任浙江學政。由此可見，應泰任職期間，當是在順治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間。恰好與張縉彥有三年左右同時在浙江。泊園藏本《說郛》上，其署籍貫為「溧陽」，自當是由於豐潤（河北省豐潤縣）位於薊運河上游溧水之陽的緣故。

由上述三人的情況，在時間地點上是吻合的。史籍中雖未明載其補輯《說郛》一事，但卻有谷應泰任浙江提學僉事時：

杭州擅湖山之勝，應泰銜校之暇，輒登臨眺覽。●

的記載此處「銜校」一語，當指其校刊文獻典籍而言。張縉彥亦「官浙江時，編刊《無聲戲》二集」●。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新舉進士的盧高，三人聯手補輯《說郛》，無疑是有條件的，其時間當在順治十三年至十五年間。既曰「補輯」當是由於對前任浙江提學僉事李際期（順治二年至六年在任）●刊本有所不滿而致。以谷應泰的編纂《明史記書本末》表現出來的學識和能力，或當有所發現，但兩個版本內容究竟有何不同，因未遑仔細比較，不敢妄言。這一問題已超出本文範圍，將有待日後繼續探討。

● 《清史列傳》卷七十〈谷應泰傳〉（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七）。

● 同上書，卷七十〈張縉彥傳〉。

● 同注●。